



评比材料多、杂事负担重、岗位抽调烦

谁“抢”走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记者发现，评比考核过多、无关社会事务进校园、频繁抽调中小学教师等“槽点”在多地存在

■记者发现，虽然教育部也多次表示将出台相关举措，但各地仍缺少系统、具体的措施办法

■受访基层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界专家呼吁，刹住侵占教师教学时间这股不正之风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漫画：新华社发（程硕作）

师跟着，主要是填手册、拍照、打卡签到这些重复劳动。”她说，“现在拖慢了复习进度，学生们都很着急。”

——“在线负担”繁重。有一线教师透露，因为教育系统人教众多，各种APP下载、公众号关注、朋友圈点赞、网络问卷答题等“在线负担”往往被硬塞给老师们，不少甚至溢出成为“家长负担”。“经常要发动孩子和家长，班主任在群里督促，家长截图留证，为网上拉一票到处求人，家长们也有厌烦情绪。”一名小学校长说，“‘家校合作’不应是这样做法。”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病灶”

“给老师减负刻不容缓了。只有学校和老师把全部精力投入教学，才能提升教学质量。”河北省邯郸市邱县第一中学校长韩明耀说。

专家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些地

方教师难务正业的“病灶”。有教师反映，“迎检首先就是写材料，有材料才能证明你做事了，现在‘文来文去’太多。”

“不少教师下乡扶贫成了填表做数据、拍照打卡，就是空对空。”一名结对3户贫困户的老师则认为，“教书育人本身也是扶贫扶志的一种重要途径，老师不是万能的，扶贫任务应当切合实际。”

官僚主义形成的负担也在“蚕食”老师们宝贵的精力与时间。东北一名教师告诉记者，有校领导把县领导写的文章发到学校群里，要求每个老师转发、点赞，并且截图发到群里。

冀中某镇教育办周主任称，有的领导干部“万事甩基层”，有工作用基层“顶缸”，出问题要基层“背锅”。还有的干部政绩观扭曲，把“搞形式”当工作成绩，拼命“包装”政绩，给下级造成额外负担。“一些地方教师队伍受害不浅。”

还有乡村小学校长反映，教育部门倾向

于从基层学校借调人员，造成学校剩下的老师人均工作负担更重。记者走访东部某市教育局宣传部发现，该部门7名工作人员，有5人实际上是编制在基层学校的教师。

■专家：保障教师主业时间需强化顶层设计

今年9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务进校园、抽调中小学教师等事宜，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记者发现，虽然教育部也多次表示将出台相关举措，但各地仍缺少系统、具体的措施办法。受访基层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界专家呼吁，刹住侵占教师教学时间这股不正之风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纠正形式主义的检查评比方式，多到现场、重实效。“像校园安全、德育，这些检查确实是必要的，但形式也应改进。”一名小学校长说，“如文明校园评比，一人多高的材料检查组往往就扫两眼，怎么对得起这么多纸张，还有背后的财力物力人力？”

落实依法治教，从源头上精简检查评比活动总量。河北临漳一位中学校长建议，专项清理“进校园”项目，严禁侵占正常教学时间、德育活动时间、体育锻炼时间，控制任务摊派，明确学校和教师的责任边界。

“让管理的归管理，教学的归教学。”韩明耀介绍，今年邱县积极给基层学校、一线老师减负，“我们将教育学生和提升教师业务能力放在第一位，明确职能和分工，不让与教学无关的事务性工作增加教师负担。”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吴文诩）当前，面向未成年人的各类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涉诉的教育培训机构，在合同上大做“文章”，签订“霸王条款”，机构之间相互“转包合同”甚至出现“阴阳合同”……不仅未成年人没有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家长维权也费时费力。

家长“粗心大意”不看合同，问题机构打“擦边球”逃避监管

今年6岁的林林（化名）此前曾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并缴纳数万元托管费。2018年6月的某天，林林妈妈发现孩子身体有淤红伤痕，经询问，林林称在幼儿园被外教老师掐了脖子、打了脸和后背，家人随即报警。警方在调查监控与多方查证后确认，该外教不仅实施了殴打行为，而且本人不具有教学资质，事后已逃至境外。林林家人将该幼儿园诉至法院。

类似林林所在的问题机构并不是孤例。教育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万所，其中超过一半的机构存在问题需要整改。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各类未成年人教育培训机构增长迅速，涉及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数量也同步增长。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数据显示，近三年来，该院受理的涉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同比增长超过50%。

北京市一家从事小学课后补习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万可（化名）告诉记者，正规教育培训机构审核严格、经营范围有限。但目前涉未成年人培训机构行业有一套“潜规则”：在办理营业执照时，在经营范围中涵盖技术培训、教育咨询等内容，进而直接招生开课。“这种做法不仅通过打‘擦边球’逃避了监管，也向家长隐瞒了资质‘缺陷’。各培训机构还自行制定格式合同，尽一切可能免责。”

北京丰台法院方庄法庭法官李蕊表示，尽管国家教育法对教育培训资质有严格规定，但在涉诉案件中发现，大量培训机构并未取得办学许可证，一些“教师”也并无相关教学资质，只是由在校学生、从事过教育工作的社会人员担任，甚至有些还冒充“名师”。

此外，学生家长法律风险意识严重不足，以致维权难。记者梳理近年来北京各级法院涉诉案件发现，一些培训机构尽管同时面临10多起诉讼纠纷，但不少家长仍然听信宣传交钱报名；有的家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课程内容、已学课时等记录相对较少，出现纠纷时举证困难；还有一些家长虽签订了合同，但从未完整看过……

“暗礁”丛生：“霸王条款”“转包合同”“阴阳合同”

据办案法官介绍，近几年大量涉诉案件表明，当前教育培训机构签订的合同“暗礁”丛生。比如，合同内暗藏免责“霸王条款”、培训机构之间相互“转包合同”、签订“阴阳合同”等。

——只进不出，签订“霸王条款”。记者翻看一些涉诉案件合同发现，其中不乏免责、概不退费等无理规定。比如，“所有课程将在课程有效期满后自动截止，未结束的课程将自动作废，并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费”“合同签署7日后，无论是否开课，不接受任何原因提出的退费请求”“培训期间，出现任何安全事故概不负责”等“霸王条款”。

——“转包合同”，随意变更协议内容。李蕊介绍，一些教育机构出于经营原因将教育培训课程和相关学员转包给其他机构或公司，或随意变更上课地点、时间、老师等协议内容，造成法律纠纷。2019年初，郑女士与某早教机构签订《课程销售协议》，支付学费4000元。然而，郑女士的孩子刚上完三节课，该早教机构就将相关培训转给另一家培训机构，不再开办郑女士报名课程。郑女士要求退费，但该机构负责人仅在微信转账700余元，余款一直拒付。

——签订“阴阳合同”。万可介绍，为提升业绩，许多机构工作人员口头许诺降价、加课等优惠条件，或签订“保过班”等额外协议，但合约内容往往只体现在一方合同中，成为所谓的“阴阳合同”，增加了消费者维权难度。2016年2月，王先生与某培训中心签订《名校包过班入学协议》，并交纳2万余元费用。2017年7月，王先生的孩子参加某优质中学小升初自主招生考试，因分数未达标未被录取。王先生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培训中心应退还所有培训费，但该培训中心表示，“包过班”仅是培训班的称谓，其已提供培训服务，不同意退款。

未成年人校外培训市场还需标本兼治

面对“暗礁”丛生的培训合同，消费者怎样避“坑”维权？受访专家表示，整治未成年人校外培训合同乱象还需标本兼治。

四川邦法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佳泽表示，“霸王条款”多表现为格式条款，是一方提前拟订，并具有免除己方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特征。消费者在签订过程中应仔细阅读合同内容，充分理解合同条款的真实原意。对存在分歧或模糊的条款，要提请对方详细解释说明其真实意思，并就模糊条款双方的重新理解签订补充协议。

“家长要提高甄别能力和证据意识。比如通过天眼查、中国裁判文书网等途径查看相关机构的经营信息和涉诉信息；在签订合同和接受培训服务过程中，要保存好原始材料并做好记录；当出现改变合同内容时，消费者应将沟通录音、视频资料、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北京丰台法院方庄法庭法官金滢说。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师刘泽表示，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严格履行校外培训相关审批手续，规范培训机构在许可范围内招生，督促其主动对办学资质、招生范围进行披露，加大巡查力度，营造健康积极的经营环境。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市场需求大、前景好，但还存在不少混乱的地方，亟待主管部门引导和规范。在合同方面，可以借鉴房屋中介市场的合同范本，加入强制性保护消费者的部分条款，从源头上规范行业发展。

培训
机构
『花
样』
合
同
下
藏
『暗
礁』

未成年
人校
外培
训维
权如
何避
免『
翻
船』

应付不完的检查，写不完的总结，填不完的表格

有校长自嘲是“迎检专业户”



■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的中小学，各种检查以及与教学无关的活动纷纷进校园，令教师们不堪重负甚至影响了教学工作

■重庆某校长告诉记者，2017年学校创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校，从此，迎检成了全校上下的中心工作，“我几乎成了‘迎检专业户’”

■多位受访教师建议，应严格规范各类进校园的活动，让学校聚焦教育主业

漫画：新华社发（程硕作）

了迎检组，各块负责人按照迎检工作分工，连夜赶材料，加班做整改是家常便饭。”

而一旦验收达标学校成了先进样板后，迎检任务就更重了。“仅仅上学期我们已接待了三四拨视察，从中央、省市到区级都有。上级部门还组织了外地同行参观学习、区内经验交流、媒体采访宣传，真是疲于应付。”这位校长疲惫地说。

重庆市一所示范学校校长说：“学校教导处、德育处一起统计过，最多的时候，一个学期就接待了各类检查、指导近40次。”

有一位小学校长说：“本来争当先进是正常心态，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工作不要太突出，因为如果优秀就会成为样本，接受各种检查。”

除了迎接各种检查，还有众多与教学关系不大的活动令学校和教师疲于应对。不少老师反映，现在流行两句话——“进校园”和“从娃娃抓起”，这成为很多非教学性工作纷繁进校园的理由。禁毒、扫黑除恶甚至创建卫生城市的工作学校都要参与。

“向学生宣传禁毒知识的确有意义，但为了检验宣传效果，各种考核和检查特别繁

琐。”贵阳市一所中学副校长说，需要老师先专题学习，再组织专题班会、让学生笔试答题，最后考核的时候既要有分数量化学生考试通过率，还要准备很多总结资料。

记者了解到，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还要经常接受来自文明办、关工委、共青团、工会、妇联、科委、街道办等各级各类单位的行政指令、工作安排、评比检查。

写不完的总结填不完的表格，“留痕管理”不堪重负

不少教师反映，需要用大量材料证明“真干了”的“留痕管理”，令人不堪重负。

“什么事情都要‘留痕’。”云南一名中学校长坦言，不少工作流于形式，只注重台账管理、留痕记录，不管实际效果。“应付不完的上级检查，写不完的总结，填不完的表格，教师变成了‘表哥’、‘表姐’。”一些教师吐槽。

“现在各种检查常态化开展，而且动不动就要近3年或近5年的实施情况，缺资料就要赶紧补。不少时候组织老师加班不是为了搞教

研活动，而是为了补资料。等检查结束后，这些资料就封存在箱子里，其实一点用也没有。”上述贵阳中学的副校长说，有的领导或部门来检查，也往往就是走马观花，资料不一定看，但学校不能马虎，必须认真做好各种准备。

此外，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布置工作缺乏计划和前瞻性，“今天之内完成”“明天必须交”之类的时间限制，常常让学校疲于奔命。重庆市一所实验学校校长说，最辛苦的是学校的中层干部。“上级上午发通知，下午就要材料，就只能交给中层干部们去赶。中层干部就7个人，经常加班迎检、突击赶材料，周末都很少休息。每年都有中层干部不堪劳累提出辞职，空出来的岗位想找老师接替都难。”

切实为基层减负让学校聚焦教育主业

一些学校校长坦言，只要学校做好接待工作，检查一般就能通过。“这种主要靠检查推进学校工作的做法，本身就是形式主义。”

许多教师抱怨，现在一些部门追求的创新，很多都是追求政绩表面好看的花架子，把时间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占用大量原本应该从事教学、科研的时间。

重庆市人民小学校长杨浪浪表示，对于一些学校有必要参与的工作，应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协调安排，下达指令，避免“婆婆太多”，每个部门提一点要求，布置一点任务，汇集在一起令学校难以招架。

多位受访教师建议，应严格规范各类进校园的活动，让学校聚焦教育主业。一方面要切实落实相关减负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细化政策，避免各类检查“搭车”进校园。此外，杨浪浪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服务意识，深入学校调研，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尊重客观教育教学规律，更好地服务学校，推动教育工作的发展。

中国推进低碳氢能源社会的示范区。

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示范效应已经显现。美国国家气体技术研究院总裁兼CEO大卫·凯罗尔在论坛上展示了与山西阳煤集团的合作成果——双方共同设计的全球首台R-GAS煤气化炉。

“科技的进步会使煤炭更高效、更清洁地利用。”大卫·凯罗尔说，这种气化炉可以解决山西乃至全国高灰熔点煤炭的直接气化难题，是应对“更多能源，更少碳排放”挑战的范例。

作为仍以传统能源为主的省份，山西也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今年6月，山西与国际能源署共同发表合作意向声明，双方在提高效能、发展氢能等方面形成共识。

今年以来，山西已发布两批共21个能源领域国际揭榜项目，面向全球广发“英雄帖”，引来奥地利AVL李斯特公司等国外顶级科研团队成功揭榜。

正在举行的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也是推动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缅甸自然资源环保部部长翁温说，气候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缅甸是全球第三大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这次论坛非常及时，我们全力支持低碳发展方面的合作。”

新华社太原10月23日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寇伟说，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油气资源不足，风能、太阳能、核能、氢能也主要转换为电能使用，推进电气化，意义重大。

在山西，黑黝黝的煤炭也在告别“肮脏能源”的标签。走进山西企业展区，一块普通的煤炭也能学会“七十二变”，变成各种高端化学材料。

潞安集团工作人员介绍说，使用高硫煤生产的高端润滑油基础油，通过美国雪佛龙公司油品检测，可有效缓解中国市场对高端润滑油的需求。目前，企业从煤炭中延伸出的精细化学品已有54个品种。

能源革命在改造传统能源的同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山西省霍州市赵家庄村村民张忠志的豆腐坊里已经看不到一点烟尘。两年前，他拆除沿用几十年的燃煤灶，花3000元进行了“煤改气”。同时进行改造的，还有周围58家豆腐坊，每户得到了当地政府提供的2万元补贴。

“以前一个月要烧好几吨煤，现在虽然燃气成本比烧煤高，但省时省力，关键是空气质量变好了。”张忠志说。

在氢能源领域，日本丰田、JXTG等企业已开始与中国沿海地区合作。日本能源环保国际促进会会长竹川东明说，山西拥有丰富的煤制氢资源，提升山西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必将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展区外的街道上，蓝白相间的纯电动出租车有序驶过。2016年，太原市成为纯电动出租车的城市。近年来，绿色生活理念渐入人心，这些出租车形象地称为“马路上的蓝天白云”。

展区外的街道上，蓝白相间的纯电动出租车有序驶过。2016年，太原市成为纯电动出租车的城市。近年来，绿色生活理念渐入人心，这些出租车形象地称为“马路上的蓝天白云”。

展区外的街道上，蓝白相间的纯电动出租车有序驶过。2016年，太原市成为纯电动出租车的城市。近年来，绿色生活理念渐入人心，这些出租车形象地称为“马路上的蓝天白云”。

展区外的街道上，蓝白相间的纯电动出租车有序驶过。2016年，太原市成为纯电动出租车的城市。近年来，绿色生活理念渐入人心，这些出租车形象地称为“马路上的蓝天白云”。